

 三味学术文丛
SANWEI XUESHU WENCONG

主 编 谭五昌 张 景

徐 妍 □ 著

新时期以来鲁迅 形象的重构

Xingshiqi Yilai Luxun
Xingxiang De Chonggou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鲁迅 形象的重构

李欧梵 著
Lionel H. Lee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徐妍 □ 著

新时期以来鲁迅

形象的重构

Xingshiqi Yilai Luxun
Xingxiang De Chonggou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 /徐妍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3

(三味学术文丛. 第1辑)

ISBN 978-7-5336-4921-0

I. 新… II. 徐… III. 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9280号

责任编辑:何焕生

装帧设计:朱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 mm×960 mm 1/16

印 张:26.75

字 数:400 000

版 次: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000

定 价:36.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序 言

曹文轩

这些年每年都要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我会常常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期待学生们写出具有个人风格的性灵文字；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强调学位论文的规范性、科学性。不过，二者冲突时，还是需要向学生申明我的立场：对于学位论文而言，规范性、科学性是重要的。毕竟，按照学位论文的标准，严谨的学理性比作者的才情更为重要。

这种冲突，在指导我的博士生徐妍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再一次相遇。

徐妍是一位以性灵文字见长的学生。写作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感倾向选择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对研究对象进行体察。虽然经过三年读博阶段的专业规训，徐妍还是没有能够祛除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客观地说，这样的文字更适合于文学批评，而不特别适合于学术研究。但是，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学术研究一定要摒弃性灵文字吗？性灵文字在语言层面的美感，在思维层面上的直觉判断力，有时恰恰可以为学术研究带来敏锐的发现。

当然，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隐含了作者的情感与才情，关键是作者

如何处理自己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

看得出来,徐妍的博士论文写作试图直面并处理情感与理性、才情与学理之间相冲突时的矛盾关系,或者说,徐妍试图在诗性的文风之外,练就另一副叙述和思辨相交织的笔墨。

这样,徐妍的博士论文选题没有选取她通常的强项——文学本体的研究,而接受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选题——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研究。事实上,这一选题,即使对于一位鲁迅研究的专业学者而言,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需要详细考察鲁迅研究在新时期中国文化、政治领域的影响的来龙去脉,细致辨析鲁迅研究者的研究文本的突破与局限,而若完成这些任务,研究者必须俯临并把握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还要在免除自身在思想意识层面里的思维模式的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对诸多鲁迅研究者的鲁迅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

徐妍以学术勇气与学术热情克服了诸多困难。这种学术勇气与热情主要源自她的学术兴趣。她曾经说过:鲁迅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联系,一直都是一个令她很着迷的话题。当然,这种勇气与热情更来自于学理上的自觉意识。新时期的鲁迅形象重构,其情形十分丰富、复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以专题的形式且又以如此大的规模,对“重构”进行梳理和辨析,是一新的工作。

那么,这一工作意欲获得什么样的学术目标?它旨在通过对新时期鲁迅“重构”的回顾与描述,从而呈现出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想的变迁轨迹。从这个目标出发,论著在文学史的建构、鲁迅研究史的书写以及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历程等方面,都很有意义。

论著在写作上也较为聪明。作者没有采取全面描述“重构”的做法,而只是选择一些具有历史意义与代表性的重大事件作为切入点,进行细致解读,辐射其他方面,从而巧妙地呈现出重构的历史。尤其,论著呈现出一种较为独特的叙述风格、精神气质:回到鲁迅本体,回到阐释文本,回到研究者的感受力,回到边缘的批评立场。

鲁迅形象是否有一个基本面?几乎从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诞生起,鲁迅形象就这样或那样地被阐释。随着时间的

推移,原初的鲁迅形象越来越遥远。虽然已有研究者提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让人很激动了一段时日,可那毕竟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理想化色彩。事实上,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鲁迅。由此,这本论著也不可能担当“回到鲁迅那里去”的重构之重。更何况,这本著作所关注的本来就不是鲁迅本体研究,而是鲁迅研究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放弃了对于原初鲁迅形象的探寻,实际上,论著不能割舍以往回返鲁迅的理想化情怀。于是,这本论著宁愿从一条迂回的道路——错综复杂的鲁迅研究的研究中接近鲁迅原初的丰富形象。论著确信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原型意象这一基本面的存在,由此警惕一切附加在鲁迅形象之上的附加值。于是,在笔墨的分配上、情感的判断上都有所侧重、有所流露。即该著作隐含了这样的判断:无论鲁迅研究的阐释文本有多少差异,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即新时期的鲁迅重构是以还原鲁迅本体为前提的。

为了呈现新时期鲁迅重构的脉络,徐妍的论著将结构设计为“建构”和“解构”两条线索。不过,论著并没有依据“建构”或“解构”的言路的差异而简单化地对其选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论著一方面以翔实的材料叙述“建构”或“解构”的来龙去脉,以尽量使得这些材料回到历史现场;另一方面又对这些翔实的材料进行了“文本”细读,以辨析这些事件生成的内在原因。当然,这里的文本细读不是指将研究者的阐释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将其敞开,与“文外事件”相参照。从文本的横切面切入,以文化思想的“文外事件”打通这些有代表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然后,再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地分析鲁迅被重构的原因。回顾鲁迅研究史,曾经存在预设的阐释意图一统鲁迅研究天下的局面。一个阐释文本一旦出现,就立刻被一种理论的预设所操纵。这样的鲁迅研究,既没有尊重鲁迅本体,将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也是没有耐心地阅读鲁迅文本。这导致了权威话语的中心地位,导致了模式化阐释的普泛化,导致了鲁迅本体形象的被遮蔽。最终,原初的鲁迅,曾经远离我们而去。而该著采用“文本”细读的路数,对于鲁迅的阐释文本进行细读,既尊重了鲁迅本体,也尽力客观地描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史的发展脉络。

与“文本”细读的路数相关,就是徐妍在论著中对于感受力的坚持。如果说感受鲁迅是接近鲁迅的一条路径,那么,感受鲁迅研究者也是一种接近鲁迅研究者的一种方式。由于论著一方面将鲁迅研究史的梳理作为主要线索;另一方面又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分析作为另一条平行线,两相对照、补充,构成全书的内容,所以,论著既着重考察生成重大鲁迅研究事件的思想文化背景,又以诚挚的感受力体味研究者的心理世界。即该论著除了呈现“世道”,同时还探究“人心”。在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以人心交换人心,是贯穿这本论著始终的对话方式。事实上,鲁迅本体原本就是一个感受力极其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鲁迅研究者若想接近鲁迅,也必得具有同样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只是在鲁迅研究史上、在一段历史时间里,鲁迅研究者以理智力压抑了感受力。但是,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唤醒感受力而唤醒自身,通过省察自身而重构鲁迅。即便从阐释学的立场来看,那种细致的、敏感的感受力,与知识、理论所提供的逻辑力相比,仍然可谓第一性的存在。而且,如果鲁迅研究者将感受力看作一切阐释鲁迅的最基本的基点,一切背离鲁迅的伪鲁迅研究就会被甄别。同样,一切接近鲁迅的鲁迅重构也就会自行呈现出来。沿着这样的思路,该著进一步追问:究竟什么缘由让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与鲁迅再度相遇?除了现代性的宏大命题,是否还有知识分子隐秘的心理需求?批评的前提是理解,在理解的前提下提出质疑,该著从感受力的起点出发,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当然,感受力的强调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过多的体贴与认同,有时甚至有可能出现该著所说的“被同化”现象,但“感受”,是思维的起点。“感受”生成了敏锐的问题意识,“感受”激活了语言的生命感。最终,“感受”使得该著关注的不仅是社会历史文化,而且还有阐释者的个体生命形式。

徐妍的论著还立足于边缘的批评立场。先做一个置身于批评之外的倾听者,然后再做一个置身于批评之中的阐释者,这是徐妍这本论著的研究立场。所谓倾听者,就是论著作者在梳理鲁迅研究史的过程中既不盲从于鲁迅研究史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各种权威观念,也不带

入一位专业研究者所预设的主观阐释意图(至少主观意识不想带入),而是将每一位鲁迅研究者作为同等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以感受的方式细读研究对象的阐释文本。所谓阐释者,就是论著作者在倾听之后,以批评者的视角就事论事,知人论事,尽量辨析不同事件、不同鲁迅研究者之间的差异与联系,悬搁以往强加于鲁迅形象的各种附加值,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种边缘立场的选择,除了由于论著作者第一次“介入”鲁迅研究,属于“圈外人”的身份之外,还由于作者坚持“圈外人”的研究立场。“圈外人”看鲁迅研究,有其短,也有其长。“短”,在此不言自明。倒是其“长”,需要申明。“圈外人”意味着一种自在的生命状态、边缘者的阐释视角和无所羁绊的批评话语。“圈外人”尽管囿于自身思维的限定,可能偏颇与疏漏,但不失学术的纯真与庄严。

这本著作是徐妍学术研究的初始之作。它无疑带有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徐妍对于博士论文初稿进行了耐心的修订,有些论点还是不太成熟,表述也有不够清楚之处。但是,其想象力的丰富、问题意识的敏锐、语言的生命感,都是该著值得称许的地方。尤其,鲁迅研究史与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相互生成在这个著作中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2006年11月1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 录

序 言	001
绪 论	001
上篇 集体性鲁迅	019
第一章 两个“凡是”的双重标准:再解读茅盾对“神化鲁迅”的质疑——以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为中心	021
第二章 鲁迅诞辰 100 周年背后话语的认同与裂隙	045
第一节 以仪式的形式悬搁记忆	046
第二节 周扬的报告:由“代言”到错位	054
第三节 1981 年的中国知识群体:战栗的启蒙者之梦	065
第三章 精神文化视角下的鲁迅:主体性回返的恒与变	081
第一节 重审《杂文报》《青海湖》风波:主体意识的纷纭投影	082
第二节 转型的“镜子”:“实践性主体”的文化想象	094
第三节 转折的“探寻”:“精神性主体”的自我隐喻	121
下篇 个体性鲁迅	147
第四章 个体生命的复杂性探索	149

第一节	鲁迅诞辰 110 周年:梦幻期的终结与分化	149
第二节	现代知识者鲁迅与悖论的“自我”——以汪晖的“概念 清理”为中心	162
第五章	个体生命的多样性读解	200
第一节	神圣与世俗:两种理想主义的对峙	200
第二节	退居书斋的学人思路:“学者”鲁迅被重构的逻辑与悖论 ..	225
第三节	叙述学和细读的升温与冷却:形式本体鲁迅的探索	248
第六章	反思、理解与对话:“后启蒙”知识分子鲁迅重构的 演变	268
第一节	从“被同化”到反思:“精神性主体”的深化	269
第二节	从想象到理解:“实践性主体”的低调转换	281
第三节	从反思到体悟:张梦阳对鲁迅“人学”思想的阐释言路	291
第四节	从独白到对话:“后启蒙”年轻知识分子对鲁迅原质的解读 ——以孙郁的鲁迅重构为个案	308
第七章	世纪之交越界的解构和重建学理新秩序	324
第一节	《收获》风波:新意识形态下的解构行动	324
第二节	鲁迅诞辰 120 周年:新意识形态下的低调整合	347
第三节	鲁迅研究的学理思路与鲁迅学的建构——以 2004 年“鲁 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363
第四节	跨文化视阈下对“东亚鲁迅”的阐释——以 2006 年纪念鲁迅 诞辰 125 周年暨逝世 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377
结 语		407
参考文献		410
后 记		415

绪 论

一

新时期以来的鲁迅形象重构,是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①对于自身精神演变的书写形态。换言之,考察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状况,新时期以来的鲁迅形象重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因为新时期鲁迅形象如何被重构,几乎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过程。新时期鲁迅形象的重构远非任何西方思潮的“外部冲击”可以决定,也并非仅仅由于鲁迅形象自身的丰富性可以生成,而是源自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内部需要,即在重构鲁迅形象的背后,隐含着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选择。可以说,新时期鲁迅形象如何被重构,与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精神构成有直接关联:一方面,被重构的鲁迅形象参与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另一方面,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身,也便如何重构鲁迅形象。

① 本书的“知识分子”认同殷海光的观点。一方面同意《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的严格定义: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另一方面也同意海耶克的宽泛标准: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特别必须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以上观点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第543—545页)殷海光认为,《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严格社会文化建设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准备以编年史的方式全面叙述,只是选取鲁迅形象重构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为切入点。“事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纯粹的历史事件。它还包括某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所引发的论争。或者说,在本书中,有重大影响的著作本身也是重大的重构事件^①。换言之,对于鲁迅形象的重构而言,围绕鲁迅本体世界研究的著作相当于其内部事件,而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重大影响相当于其外部事件。离开著作的纯粹外部事件与离开外部事件影响的纯粹内部事件都是不可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新时期以来的鲁迅形象重构无论有多少差异,阐释者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他们的建构与解构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毛泽东和瞿秋白对鲁迅的经典评论出发,反过来对毛泽东、瞿秋白的鲁迅论进行再评价,进而重新发掘鲁迅“立人”思想的要义。尤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缘此思路,质疑了政治意识形态规定下的鲁迅形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规定的鲁迅形象固然与毛泽东、瞿秋白的鲁迅论有某种关联,但不能简单化地等同于毛泽东、

^① 汪晖在《死火重温》的序言里,就将文章看作“事件”：“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看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参见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页）

瞿秋白的鲁迅论^①。毛泽东、瞿秋白对鲁迅的经典评论虽然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阐释鲁迅的立场、方法,但它们的经典性不在于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介入,而在于意识形态的立场、方法与政治革命领袖的阐释视角、批评目光、历史使命相结合并达到了当时文化语境的最高视阈。换言之,毛泽东、瞿秋白对于鲁迅的经典评价可谓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对鲁迅研究的“极限”发起的冲击和超越,当这种超越变成前瞻的现实时,它们便具有了经典的意义。

然而,经典评价一经被确立,也就同时置身于悖论之中:一方面,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恐怕是因为它们具有文化价值的稳定性和象征性;另一方面,它们正是由于获得了某一个时代的青睐,才能使自己得到被大多数人崇拜的位置,然后一劳永逸地存在下去。毛泽东、瞿秋

① 毛泽东在1937年、1940年对鲁迅的评价构成了当代文化语境中鲁迅研究史的经典阐释理论,指导、规定着当代鲁迅研究的总体思路。毛泽东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鲁迅论——在“陕公”纪念大会上演辞》,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8月版,第889—890页)“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3月版,第32页)尤其,这两段至高无上的评价,隐含着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历史洞见与战略眼光:鲁迅不仅被纳入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里,而且被纳入到共产主义的全球化理想中;鲁迅不仅被整合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文化旗帜之下,而且还被解释为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当然,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所建构的鲁迅形象与作为个人的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形象也有所区别。前者与后者相比,会出于政治家的目的而有所取舍、有所保留。

瞿秋白在1933年将鲁迅概括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友人,以至于战士”,将鲁迅思想道路总结为“从个性主义进到集体主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何凝编:《鲁迅杂感选集》,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0月版,第818页)其中论述,在新时期鲁迅研究者看来,虽然存在着“视阈仍然不够开豁”和“概念缺乏足够的准确性”等缺陷(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20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51页),但其经典意义在于:一方面回应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各方(包括无产阶级内部)对鲁迅的诸种诘难,另一方面又以左翼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对鲁迅的精神特质进行了高度的总结,在中国文化革命史的立场上回答了“鲁迅是谁”这一问题。

白关于鲁迅的经典评论也同样不能逃离经典的命运。假如后来的鲁迅研究者没有把他们关于鲁迅的经典评价所隐藏的或者关联的额外意义负荷揭示出来,那么经典评价很可能被反复重复或者“过度的解释”,甚至任意评说。事实上,瞿秋白、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具有不同阐释意图的阐释者不断阐释,不仅逐渐抽空了鲁迅形象原初的内涵,而且也逐渐远离了瞿秋白、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原初精神,直至最终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争夺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尤其,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论述的“空白、沉默与沟壑”^①,被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阐释意图填满、夸大和教条化地发挥。当然,其中原因,并不能归咎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鲁迅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永远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者。或许,经典之所以被工具化,除了自身的存在理由,还与一个民族史上的民族文化心理相暗合。

二

“鲁迅形象”在新时期以来的命运,即鲁迅形象在新时期如何被重构,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了论题的需要和叙述的集中,并考虑到本书所能担负的容量,笔者只选取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鲁迅形象重构这一脉络,而将其他方面对鲁迅形象的重构放弃了。即便涉及,也只是作为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重构鲁迅的文化背景或参照对象。

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性重构与90年代后的个体性重构。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当然,这两个阶段的鲁迅形象的重构并不完全恪守时间的线性规则。本书一方面采用线性的时间叙述鲁迅形象被重构的过程,因为鲁迅形象确实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本书又超越了线性时间的规定而让时间跳跃、绵延,因为任何一种类型的鲁迅形象都不是如线性时间那样泾渭分明。每一种类型内部

^① 参阅蓝棣之:《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见《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223页。

都存在着复杂的细节性构成。每一种类型自身又冲突不断,每一种新演变的鲁迅形象都是对鲁迅历史形象的批判或超越,但也正是生成于对鲁迅历史形象的阐释链条中,尽管新的阐释文本在外部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姿态。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新时期伊始至 80 年代末,鲁迅研究者在经历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阐释的余波后,开始以个人的名义承担社会记忆并重构了集体性的鲁迅形象。

新时期开始,鲁迅研究并没有即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阻滞期。鲁迅形象虽然结束了“文革”时期被扭曲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阐释者可以走出固有的思维模式。鲁迅形象的重构仍然遭遇到无形而巨大的阻滞——“左”的教条主义。“左”的教条主义纵容了惯性思维,且使研究者在突围途中钝化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新时期初始阶段的鲁迅研究的局限,正如张梦阳所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 1976 年至 1979 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精神过渡,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和极端做法提出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旧的思维窠臼和旧的真理标准。同样,鲁迅研究领域也是在艰难的精神过渡中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是又时时难以挣脱‘左’的教条主义束缚。”^①当然,仅仅“左”的教条主义,还不足以构成研究者惯性思维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左”的教条主义,研究者对毛泽东、瞿秋白的经典评价的绝对尊崇心理、研究者个人的历史记忆、知识结构等因素都一同滋生了惯性思维的形成。

这集中表现在 1979 年发生在茅盾、夏衍和李何林等之间的关于“反对‘神化’鲁迅”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生成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论争双方从惯性思维中突围的努力和限度?回溯这场论争,论争双方如何一面突围,一面秉持批评的双重标准?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可发现:“文革”结束初始阶段,鲁迅形象并没有很快地从意识形

^①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20 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 8 月版,第 531—532 页。

态的规定下解放出来,倒是在惯性思维的驱动下与“左”的教条主义达成一种契约。即使进入 80 年代中期,仍然有鲁迅研究者为了捍卫意识形态中的鲁迅而表现出一种权威话语的政治阐释学。直到 90 年代,“左”的教条主义还顽强地存在着断续的余绪^①。当然,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思想解放进程的加快、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等变革,鲁迅形象的重构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

80 年代初期,鲁迅研究经历了一个过渡期。鲁迅研究既保留了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又突破了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某些禁忌。鲁迅研究者既捍卫了毛泽东评价鲁迅的经典形象,又重新论及久违了的启蒙者思想家鲁迅形象。在这一点上,鲁迅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值得格外关注。该纪念活动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各地方的最高党政机构全权操办,可以被表达为一个“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准的盛大仪式。但是,在这个“团结一致”的盛况背后,是否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裂缝?虽然在该纪念仪式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威发言人、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建构了鲁迅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民族英雄形象,但他们的话语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为何否定了“文革”记忆,可又悬搁了“文革”记忆;纪念鲁迅,可又回避了鲁迅的启蒙者形象?它们的深意是什么?意识形态主流话语是否存在着“能够拥有两种隶属于截然不同话语群的截然不同的陈述”^②?在这个仪式上,权威发言人周扬为何改变了以往有力量的明晰文风而变得有些吞吞吐吐?与会的知识分子在鲁迅如何重构上的理论资源与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存在怎样的差异^③?尤其,知识分子求同存异地与国家意识形态达成了默契的合作,他们所重构的鲁迅如何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④?这些问题的追问,应该是鲁迅诞辰

① 参见陈安湖:《为鲁迅声辩》,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版。

②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 年 6 月版,第 86 页。

③ 1980 年 8 月 3—8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议的议题是,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改变涣散软弱状态。会议强调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利于及时地克服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对那种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工作。

④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 年第 5 期。